

文章编号: 1674-9057(2013)01-0184-07

doi:10.3969/j.issn.1674-9057.2013.01.034

苗族旅游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的驱动力

——以贝江景区的勾滩屯为例

吴忠军^a, 吴少峰^a, 黄梅芳^b

(桂林理工大学 a. 旅游学院; b.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以融水贝江景区的勾滩屯作为个案,通过对广西融水贝江景区勾滩屯旅游发展情况的实地田野调查,采用AMOS 17.0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从文化景观变迁的外在和内在驱动力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当地旅游发展驱动力和文化景观变迁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互相影响并不显著,外在和内在驱动力都对勾滩屯的各个文化景观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驱动力;文化景观变迁;结构方程模型;贝江景区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志码: A

1 文化景观变迁研究现状

自美国学者 Sauer 引入景观的概念后,文化景观起源与变迁就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Sauer 认为:“文化景观是由特定的文化族群在自然景观中创建的样式,文化是动因,自然地域是载体,文化景观则是呈现的结果。”^[1]关于村寨文化景观的研究,国外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社会重构和演变研究^[2]、构成要素及其影响研究^[3]、结构和功能研究^[4]、保护和规划研究^[5]4个方面;在文化景观变迁的研究中,He X Y^[6]认为动态的景观是景观结构、功能、空间格局随时间的变化发生相应变化的过程;Abdullah S A^[7], Kristensen L S^[8]则指出景观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内外驱动力对景观组成要素的干扰作用,其结果使得景观稳定性及其空间格局发生变化。景观格局的变化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景观系统内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流动,进而对区域内重要的景观生态产生深刻影响。国内村寨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村寨文化景观要素特点、景观演化及机理、文化感知、保护与规划方面。

驱动力方面则主要研究旅游的驱动力,保继刚以西安、桂林、大连和昆明为例,研究了城市旅游驱动力^[9];郭金海在基于供求关系影响下研究了庐山旅游地生命周期驱动力^[10];旅游景观变迁的驱动力研究则相对较少,邱荣祖认为地形、地貌、土壤和旅游开发等是森林景观变化的关键性驱动力^[11],邓茂林研究了高原湿地若尔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变化及其驱动力^[12]。而学术界对桂北文化景观旅游影响研究成果也较少,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部分,对于民族地区文化景观驱动力方面的研究则更少涉及。定性研究方面有王林以广西龙脊梯田为例,阐述了梯田文化景观遗产^[13],以及对桂北龙脊梯田景区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变迁动因的分析^[14]等;定量研究如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技术及方法对侗族村寨歌舞文化的研究^[15]。

笔者通过对广西融水贝江景区勾滩屯旅游文化景观的实地田野调查,采用AMOS 17.0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从文化景观变迁的外在和内在驱动力的角度,寻找勾滩屯旅游的发展驱动力和文化景观变迁之间的关系。

收稿日期: 2012-12-06

基金项目: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0GXNSFA013017)

作者简介: 吴忠军(1965—),男,教授,研究方向:旅游开发与规划、民族旅游。

通讯作者: 黄梅芳,硕士,副教授, glhm2012@163.com。

引文格式: 吴忠军, 吴少峰, 黄梅芳. 苗族旅游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的驱动力——以贝江景区的勾滩屯为例 [J].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 2013, 33(1): 184-190.

2 结构模型构建、问卷设计和调研过程

2.1 结构模型的构建

本模型旨在进一步检验外在和内在驱动力对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潜在变量位于椭圆形内,各路径系数和系数表达式将会在变量间的连线上得到结论。此模型包含2个外生变量和4个内生变量(图1),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是外生变量,歌舞表演、聚落建筑、梯田民俗和服饰文化是内生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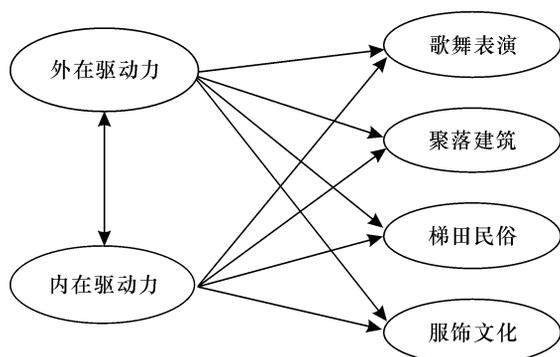


图1 勾滩屯旅游文化景观变迁驱动力概念模型
Fig. 1 Oretical model of driving force on Goutans tourism culture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2.2 研究假设

根据文献资料以及田野调查的思考,在建立以上模型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9个假设:

H_1 : 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互相影响显著;

H_2 : 外在驱动力对歌舞表演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_3 : 外在驱动力对聚落建筑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_4 : 外在驱动力对梯田民俗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_5 : 外在驱动力对服饰文化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_6 : 内在驱动力对歌舞表演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_7 : 内在驱动力对聚落建筑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_8 : 内在驱动力对梯田民俗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_9 : 内在驱动力对服饰文化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 观测变量的选取

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歌舞表演、聚落建筑、梯田民俗和服饰文化是概念模型的6个结构变量,不能直接对它们进行观测。测量指标在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意见指导下,综合了古村落的演化机理^[16]、传统聚落景观评价^[17]、中国乡村景观评价的指标体系^[18]和梯田文化景观研究^[19]等对村寨旅游文化景观变迁因素的研究,并根据田野调查研究,选取外生变量的观测变量2组、5个测量指标,内生变量的观测变量4组、14个测量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观测变量
Table 1 Observed variables of the model

外生变量	观测变量	内生变量	观测变量
外在驱动力	X_1 开发商行为	歌舞表演	Y_1 表演妆扮
	X_2 政府行为		Y_2 表演内容
	X_3 游客行为		Y_3 使用乐器
	Y_4 音乐节奏		
内在驱动力	X_4 外出打工	聚落建筑	Y_5 房屋层数
			Y_6 房屋功能
	X_5 教育		Y_7 房屋材料
			Y_8 房屋卫生
			Y_9 抛荒面积
梯田民俗	Y_{10} 耕作种类		
	Y_{11} 民间信仰		
	Y_{12} 节庆习俗		
服饰文化	Y_{13} 制作方式		
	Y_{14} 服饰功能		

2.4 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

问卷包括3部分:第1部分主要涉及被调查者的社会学人口特征及社会属性;第2部分分别是对内生变量的各观测变量调查,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分法,要求被访居民对每个测量项目从“1—无变化”到“5—变化很大”来进行打分,分值越高则说明旅游对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程度越大;第3部分是对外生变量的各观测变量的调查,同样采用要求被访居民对每个测量项目从“1—没有影响”到“5—影响很大”来进行打分,分值越高则说明该驱动力对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程度越大。笔者等于2011-06和2011-07两次在广西柳州市融水县勾滩屯进行调研和补充调研。

为了保证调研的真实有效,在调研中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现场填写、现场回收;在深度访谈中,采取以2人为一组的问卷调查小组对当地建筑工匠、旅游经营者、村干部、老年村民进行访谈,平均单份访谈时间在60 min以上。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100份,其中有效问卷率为96%。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和AMOS 17.0结构方程模型软件对有效问卷进行分析。

2.5 研究区域

勾滩屯是广西融水县贝江景区的自然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县新安乡。截止到2011-06,勾滩屯共有78户,339人,全屯村民多为半山苗、小部分为汉族。整个自然屯耕地面积9.53 hm² (143亩),其中水田3.33 hm² (50亩),旱地6.2 hm² (93亩)。在旅游未开发之前,勾滩屯主要从事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竹、木收入。1991年起开发旅游,村民通过民族舞蹈表演、餐饮、卖手工艺品等各种形式开展旅游经营活动。近年来,勾滩屯年均旅游总收入约100多万元,旅游取得较好发展。勾滩屯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到2012-07为止,仍无道路通入,居民依然靠划船从贝江进出,而游客也是从码头乘坐游船或者偶尔搭乘村民的船只进出。本文选取该景点进行文化景观变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3 数据处理

3.1 受访者描述性统计分析

问卷的第一部分主要从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和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来考察旅游地社区居民情况,具体如表2所示。

本次调研样本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各年龄段都分布的比较平均,表明问卷发放的稳定性较高。被访居民受教育程度均不高,从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来看,将近半数的被访居民已从事旅游经营活动,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农和外出务工。从整体来看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调研样本抽取比较合适。

3.2 调研地文化景观变迁情况

勾滩屯村民多为半山苗,聚落由上而下以水源林、梯田到村落的形态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贝江在村前缓缓兀自流过。村民喜食酸鱼酸肉,

家中妇女常聚一起打油茶话家常,乐器以竹笙为主,节庆喜爱跳多踩堂和多耶舞等,年轻人恋爱有“坐妹”等习俗。在问卷调查中,村民对所提到的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感知不一,对于不同景观变迁程度的感知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因子的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3所示。

表2 样本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

项目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性	51	53.1
	女性	45	49.9
年龄	15岁以下	2	2.1
	15~24	24	25
	25~34	19	19.8
	35~44	11	11.5
	45~54	24	25
学历	55岁以上	15	15.6
	初中及以下	82	85.4
	高中/中专技校	12	12.0
旅游经营意愿	大专及以上	0	0
	已从事旅游	39	40.6
	未从事但想从事	27	28.1
家庭收入来源	未从事且不想从事	20	20.8
	务农	43	44.8
	旅游	12	12.5
	外出务工	25	26
	其他	16	16.7

表3 文化景观变迁因子变化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change factors

观测变量	均值	观测变量	均值
Y ₁	2.729	Y ₈	3.074
Y ₂	2.789	Y ₉	2.128
Y ₃	2.151	Y ₁₀	2.447
Y ₄	2.406	Y ₁₁	1.713
Y ₅	2.271	Y ₁₂	2.042
Y ₆	1.968	Y ₁₃	2.394
Y ₇	2.495	Y ₁₄	3.221

可以看到,勾滩屯的文化景观观测变量总的变迁平均分布指数均止于“变化一般”的状态,大多数总体变化水平较小,可是每一个考察的指标却相对应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说明作为旅游的重要吸引物,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总的变化水平较小,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房屋卫生,变化最小的是民间信仰。

3.3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信度描述了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反映问卷的可靠性。问卷中对模型中所有的观测变量的信度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进行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80，大于 0.7，说明获取的数据信度比较良好。对模型中所有的 19 个观测变量进行重复度量的方差分析，所有的观测变量 t 检验都在 0.001 水平上显著，能够很好的解释相应潜在变量。然后检验内生变量所对应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发现所有的因子载荷在 0.42~0.88，基本上符合标准，说明观测变量受到潜在变量的影响程度比较高，能够较好的解释潜在变量，因此观测变量的效度比较可靠。

3.4 测量模型分析

目前结构方程模型还没有能彻底保证模型收敛的充要条件，但有一些基本的适配度指标用来对模型整体进行评估。首先，采用结构方程软件 AMOS 17.0 的极大似然法迭代 18 次对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分析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影响，以便检验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度。在拟合度指标的考虑上，选取绝对拟合值 χ^2 、 χ^2/df 、CFI 和 RMSEA 以及相对拟合指标 IFI、PNFI、PCFI 来进行考察。其中，拟合度的卡方值检验小于 2 表示适配度较佳，CFI、IFI 大于 0.9，PNFI、PCFI 大于 0.5，RMSEA 小于 0.08，模型可以接受。研究表明，模型 $\chi^2 = 168.277$ ， $\chi^2/df = 1.177$ ，CFI = 0.947，RMSEA = 0.043，IFI = 0.952，PNFI = 0.563，PCFI = 0.713，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然后，对模型的综合信度、会聚效度和判别效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表 4），综合信度都大于 0.7，可以接受，会聚效度使用潜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来进行检验，AVE 基本均大于 0.5，可以接受。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表明指标变量被潜在变量解释的变异量百分比越大，相对的误差测量就越小。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中梯田民俗的指数略小于理想值 0.5，说明理论模型和调研数据契合需进一步加强。总体来说，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模型整体的稳定性良好。

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是为了考察提出的预先假设是否能获得检验模型的支持，其预先假设可依靠路径系数进行判别，系数愈大则表明相互间关

表 4 测量模型参数估计值及各项检验

变 量	因子载荷	信度系数	组合信度	平均变异抽取量
表演妆扮	0.793	0.629	0.892	0.674
表演内容	0.875	0.766		
使用乐器	0.821	0.673		
音乐节奏	0.793	0.629		
房屋层数	0.704	0.496	0.79	0.50
房屋功能	0.697	0.486		
房屋材料	0.827	0.684		
房屋卫生	0.564	0.318		
抛荒面积	0.571	0.326	0.70	0.40
耕作种类	0.835	0.629		
民间信仰	0.423	0.179		
节庆习俗	0.594	0.353		
制作方式	0.811	0.657	0.79	0.66
服饰功能	0.816	0.404		

系更强、影响越大。检验发现，本研究模型的各个潜在变量与预设模型间基本符合，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路径系数除假设 1 外，其他的都在 0.93 至 2.59 之间，都能在 0.001 水平下达到显著，表明除假设 1 外，其他假设全部得到支持，如图 2 所示：（1）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间互相影响能力不显著。其路径系数为 $\lambda_1 = 0.09$ ，表明在勾滩屯旅游和社会发展中的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间还不存在显著关联。因此， H_1 假设被否定。（2）外在驱动力对歌舞表演、聚落建筑、梯田民俗和服饰文化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 $\lambda_2 = 1.14$ 、 $\lambda_3 = 0.93$ 、 $\lambda_4 = 2.59$ 和 $\lambda_5 = 1.76$ ，均在 0.001 水平下达到显著，表明外在驱动力对勾滩屯的各项文化景观变迁因子间存在较大的影响。因此， H_2 、 H_3 、 H_4 和 H_5 这 4 个假设得到验证。（3）内在驱动力对歌舞表演、聚落建筑、梯田民俗和服饰文化变迁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 $\lambda_6 = 1.88$ 、 $\lambda_7 = 1.50$ 、 $\lambda_8 = 2.46$ 和 $\lambda_9 = 2.26$ ，均在 0.001 水平下达到显著，表明内在驱动力对勾滩屯的各项文化景观变迁因子间存在较大的影响，即 H_6 、 H_7 、 H_8 和 H_9 这 4 个假设得到验证，模型基本符合。

诚然，在社会的发展变迁中，文化景观的变迁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但是在相对较为封闭的旅游地，旅游的发展所导致的相关因素对当地文化景观的变迁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如何能在旅游的开发和发展中更好的保存民族民俗文化是旅游开发中面临的问题。因此，观测到底是什么影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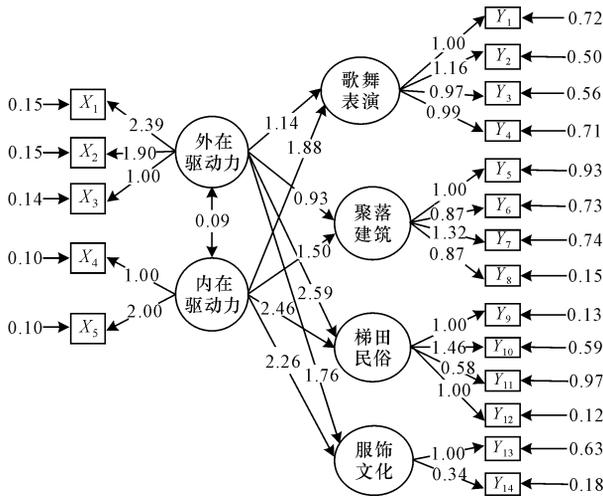


图2 勾滩屯旅游文化景观变迁驱动力结构方程模型

Fig. 2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of the driving force to Goutans tourism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民族村寨中旅游地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显得尤为重要。从模型分析,虽然外在和内在驱动力都对勾滩屯的文化景观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内在驱动力对于歌舞表演、聚落建筑和服饰文化变迁的影响大于外在驱动力所产生的影响($\lambda_6 > \lambda_2, \lambda_7 > \lambda_3, \lambda_9 > \lambda_5$),而外在驱动力则在梯田民众变迁的影响上要大于内在驱动力($\lambda_4 > \lambda_8$),表明在勾滩屯推动该地文化变迁的更多的是在于勾滩屯居民自身在社会文化上所产生的变迁。内在驱动力对所观测的歌舞表演、聚落建筑和服饰文化产生较强的影响,说明勾滩屯村民自身在外出打工中和日常教育中所接受的外部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文化本身的改变有较大的影响,这和笔者在勾滩屯目前所观察到的现状也是一致的,作为旅游地的勾滩屯依然悠闲地按照自己的步调传承和发展着文化,村民们希望能够通过旅游发展村寨,但是也依然安贫乐道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旅游只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穿插于其间。与其他的旅游村寨不同的是,交通的不便和游客的散漫对这个发展了20余年旅游的小村寨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冲击。勾滩屯的建筑绝大部分依然是木制结构,依照祖辈的传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傍水而居。村中出现的几家水泥建筑大多也是由于村民在外面感受到更好的居住条件,加上防火的顾虑,于是希望有所改善。村中入口处曾有一家水泥建筑,由于开发商考虑到影响美观,于是在水泥房外面用木头包建,村中小学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这样

使得依山傍水的苗寨的美景得到有效保护。在服饰文化变迁上,外在驱动力的影响较大,除了一些盛大的婚嫁与节庆喜事,现在勾滩屯苗寨大部分村民大部分的时候并不再穿着民族服装,因为平常干农活的时候觉得不方便。但是由于游客的到来,为了一些歌舞表演和向游客更好的兜售商品,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会更愿意在特定的环境里穿着民族服饰,而且其中歌舞表演的服饰也大多是由开发商定做而非自己手工做成。

4 结论和讨论

(1) 本文将结构方程模型引入文化景观变迁的驱动力研究,思考旅游地文化景观变迁的驱动力所在,从理论上丰富了民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的研究,也有利于旅游规划者在旅游开发的时候尽量的规避对规划地的文化发展产生的不好影响,从而彻底挖掘地区本身的文化,使之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 苗族旅游村寨文化景观变迁的驱动力研究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田野调查的心得,构建的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构成,包括2个外生变量、4个内生变量和19个观测变量,所提出的6个潜在变量分别是外在驱动力、内在驱动力、歌舞表演、聚落建筑、梯田民俗和服饰文化,各潜在变量之间存在9种关系。其中,8个假设都得到验证,仅1个假设被否定,模型具有较强的假设能力。

(3) 研究表明,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互相影响并不显著,外在和内在驱动力都对勾滩屯的各个文化景观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模型中所提出的外在驱动力为开发商行为、政府行为和游客行为,内在驱动力为外出务工和教育,可以看到开发商、政府和游客行为较好的解释了外在驱动力($\mu_1 = 2.39, \mu_2 = 1.99, \mu_3 = 1.00$),外出务工和教育较好的解释了内在驱动力($\mu_4 = 1.00, \mu_5 = 2.06$)。模型得出的结论和田野调查的观察基本也是相符的,虽然在勾滩屯旅游开发将近20多年,但是由于周边的三江程阳八寨和贝江景区中更容易到达的长赖这两个景点对客人的分流,以及交通的原因,旅游虽然一直发展却并不像前两

者那么发达，寨子里很多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外出务工而没有太受旅游的影响，而村中也依然是只有一所小学（仅是1到4年级学生，其他高小学生则需划船出去上学或到融水县城里去住读），而旅游的各利益相关者对教育也未产生较大影响。

关于文化景观的变迁方面，所提出的各个观测变量也分别对歌舞表演、聚落建筑、梯田民俗和服饰文化进行了较好的解释。观测变量表演妆扮、表演内容、使用乐器和音乐节奏较好的解释了歌舞表演（ $\mu_6 = 1.00$, $\mu_7 = 1.16$, $\mu_8 = 0.97$, $\mu_9 = 0.99$ ）；房屋层数、房屋功能、房屋材料和房屋卫生较好的解释了聚落建筑（ $\mu_{10} = 1.00$, $\mu_{11} = 0.87$, $\mu_{12} = 1.32$, $\mu_{13} = 0.87$ ）；抛荒面积、耕作种类、民间信仰和节庆习俗较好的解释了梯田民俗（ $\mu_{14} = 1.00$, $\mu_{15} = 1.46$, $\mu_{16} = 0.58$, $\mu_{17} = 1.00$ ）；制作方式和服饰功能较好的解释了服饰文化（ $\mu_{18} = 1.00$, $\mu_{19} = 0.34$ ），全部在0.001水平下达到显著，符合模型假设，说明观测因子选择有效。

（4）此外，从勾滩屯的田野调查研究中观测到，政府对开发商进行一定的监督，让旅游市场在居民间自行运做，而开发商又能提供给政府一些反馈，从而政府综合各方面的条件履行一些决策权，开发商用好自已的经营权，而居民则享有自主的选择权，这样也不失为旅游地发展的一个良性循环模式。

（5）本研究需待完善之处：首先，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的文化景观变迁因子涉及到很多方面，本次考虑的文化景观因素虽根据已有文献和田野调查进行了综合，但是其完善性仍有待加强；其次，虽然选取的研究点是旅游发展地，但是文化景观变迁的驱动力不仅只是发生在旅游学中可能产生的利益相关者方面，人类学、社会学各方面因素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我们的时间精力有限，驱动力方面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此外，本研究的抽样调查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文化景观的变迁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本文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截选了某个点进行探析，未能从动态意义上更深入地了解变迁的过程，今后的研究当中将更进一步持续关注民族村寨文化变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发展，完善测量工具，对模型做进一步修正，以提高研究的准确度。

参考文献：

- [1] Sauer C O.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1925, 2(2): 19-53.
- [2] Paquette S, Domon G. Trends in rur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and sociodemographic recomposition in southern Quebec (Canada)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1, 55 (4): 215-238.
- [3] Kamada M, Nakagoshi N. Influence of cultural factors on landscapes of mountainous farm villages in western Japan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7, 37 (1): 85-90.
- [4] Rescia A J, Pons A, Lomba I, et al. Reformulating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n a cultural rural mountain landscape in the Picos de Europa region (northern Spain)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8, 88 (1): 23-33.
- [5] Bender O, Boehmer H J, Jens D, et al. Using GIS to analyse long-term cultural landscape change in Southern Germany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5, 70 (1): 111-125.
- [6] He X Y, Zhao Y H, Hu Y M, et al. Landscape changes from 1974 to 1995 in the Upper Minjiang River Basin, China [J]. Pedosphere, 2006, 16 (3): 398-405.
- [7] Abdullah S A, Nakagoshi N. Changes in landscape spatial pattern in the highly developing state of Selangor, peninsular Malaysia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 77 (3): 263-275.
- [8] Kristensen L S, Thenail C, Kristensen S P. Landscape changes in agrarian landscapes in the 1990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farmed landscape. A case study from Jutland, Denmark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4, 71 (3): 231-244.
- [9] 保继刚, 龙江智. 城市旅游驱动力的转化及其实践意义 [J]. 地理研究, 2005, 24 (2): 274-282.
- [10] 郭金海, 任黎秀, 钟士恩, 等. 基于供求关系的庐山旅游地生命周期驱动力分析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8, 24 (2): 108-112.
- [11] 邱荣祖, 胡喜生, 朱世勇, 等. 天宝岩自然保护区森林景观格局演变 [J]. 福建林学院学报, 2009 (3): 193-198.
- [12] 邓茂林, 田昆, 杨永兴, 等. 高原湿地若尔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变化及其驱动力 [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0, 26 (1): 58-62.
- [13] 王林. 文化景观遗产及构成要素探析——以广西龙脊梯田为例 [J]. 广西民族研究, 2009 (1): 177-183.
- [14] 吴忠军, 张瑾. 旅游业发展对山地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遗

- 产保护的影响——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为例 [J]. 经济地理, 2008, 28 (5): 891 - 896.
- [15] 吴忠军, 周密.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侗族旅游村寨歌舞变化定量研究 [J]. 旅游论坛, 2009, 2 (1): 140 - 144.
- [16] 陆林, 凌善金, 焦华富, 等.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及其机理 [J]. 地理研究, 2004, 23 (5): 686 - 693.
- [17] 张祖群, 赵荣, 杨新军, 等.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评价案例与模式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11 (2): 18 - 22.
- [18] 刘滨谊, 王云才. 论中国乡村景观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指标体系 [J]. 中国园林, 2002 (5): 76 - 79.
- [19] 角媛梅, 程国栋, 肖笃宁. 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及其保护研究 [J]. 地理研究, 2002, 21 (6): 733 - 741.

Driving For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ao Village Ethnic Culture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n Goutan Village of Bei River Scenic

WU Zhong-jun^a, WU Shao-feng^a, HUANG Mei-fang^b

(a. College of Tourism; b.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case study is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from Goutan village of Guangxi Bei river scenic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se years.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mong villagers to observe their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from a view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propulsive force and between the driving force of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via AMOS 17.0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rough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hypothesis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ex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is not significant,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Goutan village culture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The whole model serves a strong assumption.

Key words: driving force; cultural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ei River scenic